

Doi: 10.20063/j.cnki.CN37-1452/C.2026.02.002

营商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基于世界经济体的实证分析

丁佐琴¹, 汪小龙^{1,2}

1. 无锡太湖学院 会计学院, 江苏 无锡 214064; 2. 天津大学 教育学院, 天津 300350

摘要: 经贸摩擦作为应对贸易环境规制的关键手段, 对营商环境的优化、产业结构的升级及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影响。波特假说和熊彼特创新理论, 可用于分析经贸摩擦与产业升级的交互作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优化营商环境对经济增长有显著正效应, 且在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经贸摩擦与产业升级的交互效应通过贸易转移和价值创造机制, 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此外, 该影响在城镇化、老龄化、发展程度和地理区域等方面表现出异质性。深入研究营商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能够为经贸摩擦环境下的营商环境优化和产业升级提供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 经贸摩擦; 营商环境; 产业升级; 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 F27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8039(2026)02-0011-11

一、引言

2025年11月,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十五五”规划的建议, 明确提出“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 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 强调“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1]。当前, 全球产业链重构加速, 国际间经贸摩擦持续升级, 中国产业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外部压力。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举措, 既是应对经贸摩擦的现实需要, 也是巩固实体经济根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2]。然而, 中美经贸摩擦的持续深化已对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性冲击, 根据海关总署2023年4月17日公布的数据, 1—3月份涉及经贸摩擦的产业产品出口同比下降13.5%, 其中芯片产品及技术进口同比下滑23%; 截至2024年5月9日, 美国商务部在出口管理条例的实体清单中新增37家中国企业, 若将2017年以来美国政府其他部门的管制措施计算在内, 目前中国被美国“管制”的企业总数已超1500家, 严重影响了

中国国际供应链稳定性, 加剧市场准入壁垒, 增加合规成本, 削弱关键领域创新能力^[3]。面对严峻挑战, 中国企业亟须突破结构性瓶颈, 扭转被动局面。因此, 产业结构升级不仅是提升经济效率、实现稳增长的内生要求, 更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破解关键技术“卡脖子”困境的战略突破口。

优化营商环境通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激发创新活力、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等路径, 对积极应对经贸摩擦、推动产业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支撑^[4]。然而, 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微观企业韧性或中观产业韧性视角, 宏观层面探讨营商环境、产业升级与经济增长协同机制的系统性研究相对不足^[5]。虽有学者提出经贸摩擦下经济增长的风险防控框架, 但多停留在理论探讨, 缺乏基于大样本数据的实证评估, 对影响程度与传导机制的量化分析尚不充分, 也未构建起涵盖多维度、可操作的综合性测度指标体系^[6]。因此, 系统揭示营商环境优化通过产业升级驱动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 既是深化理论认知的重要课题, 也是服务国家

收稿日期: 2025-10-1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大课题“新发展阶段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研究”(VFA220003); 江苏高校“青蓝工程”资助项目“优秀青年骨干教师”(JSGX004)

作者简介: 丁佐琴(1982—), 女, 江苏盐城人, 经济学博士, 无锡太湖学院会计学院副教授; 汪小龙(1983—), 男, 江西上饶人, 经济学博士, 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后(在站), 无锡太湖学院会计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战略决策的现实需求。

二、文献综述

(一)营商环境优化的理论基础与维度解构

现有研究主要从创新理论视角阐释营商环境优化的逻辑起点。熊彼特创新理论强调技术创新破坏对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作用,为理解制度环境与技术创新的互动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7]。后续研究进一步将这一逻辑拓展至国家创新系统框架,认为营商环境的优化本质上是创新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过程,涉及产品载体、技术动力、市场激励、资源配置与政府制度等递进式子系统的协同演化。近年来,实证研究多维度解构营商环境内涵,将其细化为碳排放、专利申请、双向投资、贷款利率、企业税率、政府效率、产业安全等可观测指标,验证其通过降低制度性成本、激发创新活力、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等路径促进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预期^[8]。然而,既有研究在维度整合上存在明显不足:一方面,对移民吸引、产业安全等非传统维度的纳入缺乏理论一致性论证;另一方面,各维度间的交互作用与权重差异尚未得到充分讨论,制约了指标体系的科学性与解释力。

(二)营商环境、产业升级与经济增长的逻辑链条

关于营商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学界已有了较多的研究成果,但对产业升级的中介机制关注不足。宏观层面研究多聚焦于营商环境对区域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效应,却较少将其置于“制度环境—产业结构转型—增长质量提升”的完整分析框架中加以考察^[9]。产业视角的文献虽识别出高科技产业、中心集聚产业及具备产品迁移能力产业的关键作用,但多停留在产业分类与描述层面,缺乏对营商环境优化如何精准驱动这些重点产业升级的因果识别与传导路径分析。更关键的是,在经贸摩擦持续升级的现实背景下,现有研究未能充分纳入政治经济格局重构、原产地规则限制、绿色生态壁垒与人权壁垒等新型约束条件,导致理论模型与政策实践之间存在脱节,使得探究营商环境对经济发展的最优影响成为一个兼具理论价值与现实紧迫性的议题。

(三)文献缺口与本文研究突破点

在学界长期关注国家经济增长议题的基础上,关于营商环境优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存在显著争论,主要形成三种观点:一是负面冲击论,认

为中美经贸摩擦显著抑制中国出口,对GDP、贸易福利及先进制造业发展构成多维冲击^[10];二是非线性效应论,指出贸易摩擦中农产品贸易存在品种差异性转移效应,致使影响呈非线性特征^[11];三是适应性调整论,基于美日摩擦历史经验,认为中国通过优化营商环境可以在扩大开放的同时维系总体出口能力^[12]。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三方面不足:第一,对经贸摩擦政策事件的作用机制缺乏深入解构,未能揭示营商环境优化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路径与中间机制,存在“黑箱”问题;第二,对影响因素的系统性评估不足,碳排放、创新产出、跨境投资、金融成本、税负水平、政府治理效能及产业安全等多维变量如何协同作用于高质量发展,尚需实证检验;第三,对城镇化、人口结构、发展阶段及区域异质性等情境因素的调节效应关注不够,制约了理论解释力与政策针对性。

综上所述,既有文献在理论整合、机制识别,以及政策异质性分析方面尚存在缺失,未能有效回答何种营商环境政策组合在经贸摩擦背景下对特定区域、特定发展阶段的经济体更具经济合理性。本文力图通过以下三方面作出边际贡献:第一,构建“营商环境优化—产业升级—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框架,明确各维度的功能定位与互动关系;第二,运用大样本数据识别关键传导机制,并考察城镇化、老龄化、发展程度与地理区域的异质性调节作用;第三,结合经贸摩擦的现实约束,评估不同政策工具的有效性与最优政策组合,为破解外部遏制与内部转型双重压力下的增长困境提供精准政策锚点。研究结论能够在理论上拓展现有经济增长理论的解释边界,在实践上为摆脱经贸摩擦困境、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精准政策锚点。

三、机制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营商环境优化与产业升级

营商环境优化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是全面而深远的。本文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产品环境指向绿色生态。现有研究表明,在经贸摩擦环境下,优化的营商环境能够促进产品创新投入。特别是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碳排放权交易的实施能够促进大气污染的倒U型变化,进而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13]。技术环境的文献普遍认为,在经贸摩擦的背景下,优化的营商环境能够促进技术创新、推

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14]。在经贸摩擦的大背景下,市场环境的优化实现能够有效推动产业升级。环境规制能够倒逼双向外国直接投资(FDI)的产业升级效应,尤其是“引进来”的投资过程中,需要实施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策略。中国的直接对外投资通过规模经济促进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15]。税收政策是实现资源高效配置的直接手段。环境保护税通过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和减少污染排放,激励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同时,降低企业所得税能显著促进企业增加劳动力雇佣,其作用机制包括商业信誉和产销行为的改善^[16]。组织创新处于营商环境优化的核心地位,是政府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手段。文献主要从政府效率和产业协同两方面展开。政府效率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作用,通过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包括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产业协同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需要构建“东西互济”的产业优化格局以支持中国经济的腾飞^[17]。

据此,提出假说 H1:产品、技术、市场、资源配置以及组织等层面的营商环境优化,能够促进产业升级。

(二)产业升级与国家经济增长

产业升级通过一系列复杂的经济活动和战略决策,实现对经济质量和效益全面提升。首先,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意味着企业能够通过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来获取更高的利润,通常涉及对研发的大量投入和对创新技术的深入应用。高附加值的实现不仅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也推动整个产业链的价值提升^[18]。其次,高科技含量的增加,体现了产业对最新科技成果的吸收和转化能力。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技术的发展,产业升级越来越依赖技术的融合和应用。高科技含量的提升,不仅能够带来新的产品和服务,还能够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19]。再者,产品空间的关联性和可迁移性,强调产品在不同市场和行业中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产品不仅要满足本地市场的需求,还要能够迅速适应国际市场的变化。关联性和可迁移性使得企业能够更好地利用全球资源,实现产业链的优化和重组。此外,国际产品市场和技术市场的话语权,是衡量一个国家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标。通过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加强与国际市场的交流与合作,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

中获得更大的影响力。话语权的提升不仅有助于保护国家利益,还能够为企业开拓新的市场和商机。最后,产业升级还需要政策的支持和市场环境的优化。政府通过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提供税收优惠、资金支持和市场准入便利,来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同时,一个开放、公平、透明的市场环境,也是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因素。

据此,提出假说 H2:产业升级能有效推动国家经济增长。

(三)营商环境优化、产业升级与国家经济增长

营商环境优化是推动经济体向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发展方向转型的关键。通过创造有利的政策环境和市场条件,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和产业的升级动力。首先,绿色发展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优化的营商环境通过支持清洁能源、节能减排和循环经济等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向更加环保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不仅有助于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还能够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经济的绿色增长^[20]。其次,营商环境的优化能够带动整个行业的创新氛围。通过提供知识产权保护、研发补贴、税收优惠等措施,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研发投入,从而推动新产品和服务的开发,加速产业的技术进步和升级^[21]。创新氛围的形成有助于提高产业的竞争力,吸引更多的投资,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此外,营商环境优化对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存在门槛效应,意味着当达到一定的发展水平和市场成熟度后,营商环境的进一步优化将产生更为显著的促进效果。门槛效应表明政策制定者需要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制定和调整相应的政策措施,以确保营商环境优化能够持续有效地支持产业结构的升级^[22]。最后,营商环境优化还需要考虑到不同地区和行业的特殊情况。通过实施差异化的政策,满足不同产业和企业的需求,更有效地促进产业结构的均衡发展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增长。例如,对于传统产业,通过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政策,帮助其转型和升级;而对于新兴产业,通过放宽市场准入和创新激励政策,促进其快速成长。

据此,提出假说 H3:产业升级对营商环境优化,促进国家经济增长存在中介效应。

四、研究设计

(一) 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考察营商环境影响国家经济增长的总效应 c 系数、直接效应 c' 系数,营商环境优化影响产业升级的间接效应 a 系数,以及产业升级影响国家经济增长的间接效应 b 系数。

首先,为检验营商环境优化与国家经济增长的总效应 c 系数,构建基本模型见公式(1)所示,观察系数 c 是否具有显著性。

$$NEG_i = \beta_0 + c * BUEN_i + \varepsilon_i \quad (1)$$

其中: NEG_i 为国家经济增长的类别; β_0 为截距; c 为营商环境优化的总效应系数; $BUEN_i$ 为营商环境优化的类别; ε_i 为残差。

其次,为检验产业升级对于营商环境优化影响国家经济增长是否具有中介效应以及作用程度,构建模型如公式(2)(3)所示,考察直接效应系数 c' 以及间接系数 a 、 b 是否具有显著性。

$$INST_i = \gamma_0 + a * BUEN_i + \varepsilon_i \quad (2)$$

$$NEG_i = \delta_0 + c' * BUEN_i + b * INST_i + \varepsilon_i \quad (3)$$

其中: $INST_i$ 为产业升级; γ_0 为截距; a 为营商环境优化的间接效应系数; c' 为营商环境优化的直接效应系数; b 为产业升级的间接效应系数; ε_i 为残差。

再次,通过观察系数 c' 是否具有显著性,来判断中介效应是否存在。如果系数 c 具有显著性,但是,系数 c' 不具有显著性,则产业升级具有完全的中介效应;如果系数 c 和系数 c' 均具有显著性,但是系数 $c' < c$,则产业升级具有部分中介效应,部分中介效应量为 $a * b$,见公式(4)。

$$c - c' = a * b \quad (4)$$

其中: c 为营商环境优化总效应, c' 为营商环境优化直接效应, a 为营商环境优化间接效应, b 为产业升级间接效应。

最后,为检验控制变量、经贸摩擦与产业升级交互项,对产业升级影响国家经济增长作用的异质性和交互效应进行考察,构建公式(5)。

$$NEG_i = \varphi_0 + c' * BUEN_i +$$

$$b * INST_i * TRFR_i + d * CLAS_i + \varepsilon_i \quad (5)$$

其中: $CLAS_i$ 为控制变量的类别, $INST_i * TRFR_i$

为经贸摩擦与产业升级的交互项, d 为回归系数。

(二) 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国家经济增长(NEG),包括客观国家经济发展(GNI)、主观国家经济发展($GINI$),以及替代因变量出口总额($TOEX$)^[23]。其中,客观国家经济发展为人均国民收入数值,单位为美元;主观国家经济发展为基尼系数,单位为百分比;出口总额为经济体所有产品的出口总金额数值,单位为亿美元。

2.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营商环境优化($BUEN$),包括产品环境优化($PRIN$)、技术环境优化($TEIN$)、市场环境优化($MAIN$)、资源配置环境优化($REIN$)和组织环境优化($ORIN$)五个指标,其中,产品环境优化为经济体碳排放减少数值(CO_2),单位为人均年吨数;技术环境优化为居民专利申请数量($PATE$),单位为件;市场环境优化为双向投资($INVE$)、净移民($MIGR$)和贷款利率($LEND$),单位分别为亿美元、万人和百分比。资源配置环境优化为税收政策(TAX),单位为百分比;组织环境优化为企业开办天数($GOVE$)和产业安全指数(COI),单位为天和百分比。

3. 中介变量

本文的中介变量为产业升级($INST$),为高科技产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单位为百分比;交互变量为经贸摩擦与产业升级的乘积项($TRFR$),其中,经贸摩擦为二元数值变量,2017年及以后为1,其他为0。

4. 控制变量

本文的控制变量($CLAS$),包括城镇化($URBA$)、老龄化($AGIN$)、发展程度($DEVE$),以及地理区域($CONT$),其中,城镇化是指城市的城镇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数量的比值,单位为百分比;老龄化为经济体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单位为百分比;发展程度为经济体是否为发达经济体,是为1,其他为0;地理区域为经济体是否为亚洲经济体,是为1,其他为0。表1列示本文变量的名称、符号、定义和代表性学者。

各主要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表1 主要变量定义表

名称	符号	含义	学者
被解释变量:客观国家经济发展	<i>GNI</i>	1999—2022年经济体人均国民收入数值	吕越等(2022) ^[6]
被解释变量:主观国家经济发展	<i>GINI</i>	1999—2022年经济体基尼系数	王洁菲和姚树洁(2022) ^[24]
替代被解释变量:出口总额	<i>TOEX</i>	1999—2022年经济体所有产品出口总金额	Yu L et al.(2020) ^[25]
解释变量:产品环境优化	<i>PRIN</i>	1999—2022年经济体碳排放减少数值(<i>CO2</i>)	周肖肖等(2023) ^[26]
解释变量:技术环境优化	<i>TEIN</i>	1999—2022年经济体居民专利申请数量(<i>PATE</i>)	Audretsch D B和Belitski M(2020) ^[27]
解释变量:市场环境优化	<i>MAIN</i>	1999—2022年经济体双向投资(<i>INVE</i>)、净移民(<i>MIGR</i>)和贷款利率(<i>LEND</i>)	段玉婉和蔡龙飞(2022) ^[28]
解释变量:资源配置环境优化	<i>REIN</i>	1999—2022年经济体实际税负率(<i>TAX</i>)	曾艺等(2023) ^[29]
解释变量:组织环境优化	<i>ORIN</i>	1999—2022年经济体企业开办天数(<i>GOVE</i>)和 <i>COI</i> 指数(<i>COI</i>)	李兰冰和刘秉镰(2020) ^[30]
交互变量:经贸摩擦*产业升级交互项	<i>TRFR</i>	1999—2022年经济体是否发生经贸摩擦与产业升级的乘积项	Ye M et al.(2022) ^[31]
中介变量:产业升级	<i>INST</i>	1999—2022年经济体高科技产品产值占比	易加斌等(2021) ^[32]
控制变量:城镇化	<i>URBA</i>	1999—2022年经济体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赵永平等(2023) ^[33]
控制变量:老龄化	<i>AGIN</i>	1999—2022年经济体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曹翔和李慎婷(2021) ^[34]
控制变量:发展程度	<i>DEVE</i>	1999—2022年经济体是否为发达经济体	鲁晓东和李荣林(2009) ^[35]
控制变量:地理区域	<i>CONT</i>	1999—2022年经济体是否为亚洲经济体	彭水军和吴腊梅(2022) ^[36]

(三)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的研究基于世界银行数据库中的宏观面板数据。时间跨度为1999年至2022年,涵盖199个不同经济体。在进行数据分析之前,本文对数据进行必要的预处理,识别并删除影响分析结果的异常值。对于缺失的数据,采用相应经济体的平均值进行补充,以保持数据的完整性。通过对数变换和单位变换等方法,调整变量的尺度,以减少不同经济体间数据的量级差异。经过处理后,本文构建一个包含来自各大洲不同经济体的数据集。具体包括北美洲、大洋洲、非洲、南美洲、欧洲

和亚洲。此外,为确保回归分析的准确性,本文计算核心解释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见表2)。分析结果显示,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普遍较低(0.3及以下),表明在所研究的变量中不存在显著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意味着各个变量独立地对模型的解释力作出贡献。

表3列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限于篇幅,本文未予展开说明。

表4列示熵值法计算权重结果。本文使用营商环境优化熵值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的数值进行固定效应模型回归分析。

表2 核心解释变量的Pearson系数

变量	<i>CO2</i>	<i>PATE</i>	<i>INVE</i>	<i>MIGR</i>	<i>LEND</i>	<i>TAX</i>	<i>GOVE</i>	<i>COI</i>
<i>CO2</i>	1							
<i>PATE</i>	-0.008	1						
<i>INVE</i>	0.073	0.064	1					
<i>MIGR</i>	-0.043	-0.180	0.047	1				
<i>LEND</i>	-0.120	-0.014	-0.060	0.240	1			
<i>TAX</i>	-0.050	-0.015	-0.067	0.095	0.100	1		
<i>GOVE</i>	0.033	-0.010	-0.021	-0.032	-0.100	-0.035	1	
<i>COI</i>	-0.083	0.005	0.180	-0.020	0.027	0.043	-0.032	1

注:系数0.3及以下为弱相关。

表3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简称	样本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被解释变量	GNI	4871	102.598	189170.896	12604.184	20551.287	4035.194
	GINI	4871	20.200	65.800	39.380	7.871	38.600
	TOEX	4871	0.100	2700000.000	74741.845	217465.652	6030.000
解释变量	CO2	4871	0.016	70.042	4.731	6.470	2.475
	PATE	4871	1.000	1393815.000	5947.832	49014.732	63.000
	INVE	4871	-58.323	1282.633	6.724	40.260	2.480
	MIGR	4871	-7348127.000	8859954.000	-44791.391	882468.430	-12079.000
	LEND	4871	-93.513	252.115	6.883	13.021	5.660
	TAX	4871	0.000	149.283	16.243	8.655	15.402
	GOVE	4871	0.500	697.000	39.566	53.300	28.000
	COI	4871	-3.687	2.965	0.017	0.806	0.017
中介变量	TRFR	4871	0.000	2.195	0.189	0.192	0.112
	INST	4871	0.000	0.808	0.048	0.124	0.000
控制变量	URBA	4871	7.211	100.000	56.730	23.803	56.390
	AGIN	4871	1.620	92.650	44.228	12.832	44.000
	DEVE	4871	0.000	1.000	0.200	0.400	0.000
	CONT	4871	0.000	1.000	0.242	0.428	0.000

表4 熵值法计算权重结果

变量类型	项	信息熵值	信息效用值	权重系数
解释变量	CO2	0.9244	0.0756	13.37%
	PATE	0.5896	0.4104	72.58%
	INVE	0.9926	0.0074	1.32%
	MIGR	0.9989	0.0011	0.20%
	LEND	0.9992	0.0008	0.15%
	TAX	0.9864	0.0136	2.41%
	GOVE	0.9464	0.0536	9.48%
	COI	0.9972	0.0028	0.50%

五、实证分析

(一)实证结果分析

表5展示该研究的基准回归分析结果。在模型选择上,根据 Hausman 检验的结果,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未观测异质性,从而减少估计偏误。列(1)的结果表明,营商环境优化对国家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根据以上分析结果,发现支持假说2,即通过改善碳排放、专利申请、双向投资、移民吸引、贷款利率、企业税率、政府效率和产业安全等各个方面,营商环境优化能够提升社会服务效率,促进落后产能的淘汰,提高生产要素的产出效率,并推动产业技术集聚,都是促进国家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进一步地,列(1)(3)(4)中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均显著,表明在回归模型中存在中介效应。通过比较列(3)和列(4)的回归系数,计算出中介效应的占比。具体来说,中介效应占比为 $(0.048 - 0.004) / 0.048 = 91.66%$,高比例表明营商环境优化通过促进产业升级,对国家经济增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而验证假说3。在列(4)中,将经贸摩擦与营商环境优化的交互项以及控制变量纳入方程,以同时考察两者对产业升级和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在经贸摩擦的环境下,营商环境优化对实现国家经济增长的作用更为显著。此外,城镇化和经济规模的先发优势对国家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老龄化则对国家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并且影响是显著的。

表5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i>GNI</i>	<i>GNI</i>	<i>INST</i>	<i>GNI</i>
<i>BUEN</i>	0.048 *** (2.178)	0.004 *** (2.498)	0.001 *** (6.155)	0.002 *** (2.504)
<i>INST</i>		35276.545 *** (4.988)		7477.721 *** (3.170)
<i>TRFR</i>				14316.179 *** (4.091)
<i>URBA</i>				241.196 *** (3.195)
<i>AGIN</i>				-201.787 *** (-2.654)
<i>DEVE</i>				22125.013 *** (4.378)
<i>CONT</i>				-487.800 (-0.368)
个体固定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截距	12401.563 *** (9.317)	5908.321 *** (4.951)	0.184 *** (16.001)	1539.460 (0.326)
<i>Observations</i>	4871	4871	4871	4871
<i>R-squared</i>	0.070	0.110	0.054	0.539

注:***表示在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以下各表同。

(二)稳健性检验

1.内生性检验

基准模型可能因遗漏变量、测量误差或双向因果而面临内生性问题,从而引致估计偏误。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IV)与双重差分法(DID)相结合的方式,系统甄别营商环境优化对经济增长的因果效应,并明晰两种策略的内在关联与识别差异。

本文以RCEP成员国身份作为工具变量,其合理性在于RCEP作为国际多边协定,其谈判与生效系区域政治经济博弈的结果,对单个成员国而言具有外生性,且贸易规则一体化直接改善成员国营商环境,满足相关性与排他性约束。双重差分法则利用RCEP实施前后、成员国与非成员国之间的双重变异,识别政策净效应。其优势在于无需预设工具变量方程,而是通过组间差异剔

除共同时间趋势与组间固有差异。两种方法的内在联系在于RCEP冲击既提供了可供检验的“准自然实验”(DID框架),又充当了撬动营商环境内生性问题的“杠杆”(IV框架),形成互为补充的识别三角验证。

表6报告了DID框架下的机制分解。结果显示,在经贸摩擦环境下,RCEP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变量提升13238.088单位,而非RCEP经济体仅提升4138.352单位,双重差分估计量为9099.746,且在1%水平上显著,研究结果表明,RCEP通过改善营商环境、强化区域内价值链协作,有效对冲了经贸摩擦的负面冲击。双重差分结果可视为简化式估计,而IV估计则进一步分解出营商环境优化的结构式效应,二者共同验证了营商环境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增强了结论的稳健性。

表6 内生性检验回归结果

双重差分	非经贸摩擦组	经贸摩擦组	单差分结果
非RCEP经济体组	10992.571	15130.923	4138.352 *** (6.132)
RCEP经济体组	18257.787	31495.875	13238.088 *** (5.639)
双重差分结果		9099.746 *** (3.983)	

注: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2.其他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取多种方法进行一系列检验,为保证双重差分检验方法的有效性,进一步做了平衡趋势检验以增强实证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和稳健性。结果表明,RCEP发布前,处理组与控制组在人均国民收入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而在RCEP发布后,

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为正(系数的大小和显著性水平逐年提升),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经贸摩擦中,区域经济合作和多边贸易协定发挥着重要作用。将核心因变量替换为经济体所有产品的出口总金额(Total Exports, TOEX),以检验在经贸摩擦环境下,营商环境优化对出口总额的影响程度

是否更大。替换因变量的方法有助于从不同角度评估营商环境优化的经济效应。为检验研究结论的普遍性,本文按照经济体英文名称的首字母升序排列,选取前50%的样本数进行分样本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即使在样本量减少的情况下,研究结论依然保持一致性,增强研究结果的可信度。考虑到经贸摩擦对国家经济增长存在时间滞后效应,将经贸摩擦变量滞后一期,再次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是即使在考虑时间滞后性的情况下,研究结论仍然稳健,表明营商环境优化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不随时间变化而减弱。为控制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方法。将所有控制变量作为特征变量,然后通过邻接匹配、核匹配和卡尺匹配三种不同的匹配技术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无论采用哪种匹配方法,研究结果都没有实质性变化,进一步证实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尽管由于篇幅限制,本文未能展示所有的实证结果,但上述稳健性检验方法的使用,为研究提供多角度、多方法的验证,从而增强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说服力。检验方法的应用表明营商环境优化对国家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三)拓展分析

1. 门槛效应分析

为检验产业升级对国家经济增长是否具有门槛效应,该部分使用 Hansen 门槛面板模型,对产业升级的门槛效应进行分析。门槛模型设定,见公式(6)所示。

$$NEG_{it} = \beta_0 + \beta_1 * INST_{it}, I(\tau_{IT} \leq \gamma) +$$

$$\beta_2 * INST_{it}, I(\tau_{IT} > \gamma) + \beta_3 * CLAS_{it} + \varepsilon_{it} \quad (6)$$

其中, τ_{IT} 为门槛值, γ 为待估计门槛值, $I(\cdot)$ 为示性函数,其他变量与上述公式相同。

表7所展示的结果显示,产业升级对国家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意味着在达到某个特定的发展水平之前,产业升级的影响并不显著,但一旦超过阈值,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会显著增强。具体来说,当产业升级指数低于0.189时,其对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小,系数为24365.197。然而,当产业升级指数达到或超过0.189门槛值时,其对经济增长的正面影响显著提升,系数增加至45971.923,并且统计显著性也得到加强。

以中国的案例数据为例,产业升级对国家经济增长的效应系数为70281.848,远高于门槛值之上的系数。该现象的原因在于经贸摩擦环境下,中国政府在多个关键领域采取积极措施。如:加强环境保护政策,推动绿色低碳发展,鼓励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促进技术进步,吸引外资和鼓励对外投资,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吸引高技能人才,提升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通过货币政策调控,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实施税收减免,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活力。提高行政效率,减少企业运营中的行政障碍。确保关键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安全性。措施的共同作用是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从而推动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的案例表明,在经贸摩擦等外部压力下,政府的积极政策和主导作用对于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作用显著。

表7 产业升级门槛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全样本	中国案例(含澳门、香港数据)	0.000 ≤ BUEN < 0.189	BUEN ≥ 0.189
	GNI	GNI	GNI	GNI
INST	35441.602*** (24.542)	70281.848*** (6.260)	24365.197*** (6.344)	45971.923*** (8.683)
截距	5893.234*** (15.118)	3821.104*** (11.681)	11022.44*** (6.635)	4819.576*** (10.988)
control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Observations	4871	72	3091	1780
R-squared	0.110	0.358	0.023	0.220

2. 案例实践分析

表8所呈现的内容,详细阐述了中国政府在经贸摩擦背景下,为促进营商环境优化而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具体包括,中国政府积极响应绿色环保要求。通过规范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以及相关活动,可有效应对经贸摩擦中的环境标准问题;加强核心技术的自主开发与合作开发,维护知识产权制度的稳定运行,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促进技术创新和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政府投资的作用,提高投资效益,规范投资行为,激发社会

投资活力;简化移民办理手续,吸引更多高技能人才和专业人士;为提升经贸摩擦相关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中国提高出口退税税率,以此开拓新兴国际市场,增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持续优化政府效率和保障产业安全,通过提高行政效率和确保产业安全,为经济增长提供稳定的组织保障。

中国不仅提升了自身的营商环境,也为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政策的效果在回归结果中得到体现,中国案例数据显示产业升级对国家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表明中国政府的政策在实际操作中取得积极成效,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应对经贸摩擦、优化营商环境的有益借鉴。通过高层次的政策安排和实施,中国政府展现了在复杂国际环境中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心和能力。

表8 经贸摩擦环境下中国营商环境优化政策文件一览表

序号	涉及内容	文件名称	发文时间	发文部门
1	碳减排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	2020年12月	生态环境部
2	居民专利申请	《关于持续严格规范专利申请行为的通知》	2022年1月	国家知识产权局
3	双向投资	《政府投资条例》	2018年12月	国务院
4	双向投资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	2019年12月	国务院
4	净移民	《出入境证件身份认证管理办法(试行)》	2019年9月	移民局
5	贷款利率	《关于2023年加力提升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质量的通知》	2023年5月	银保监会
6	税收	《关于提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的公告》	2020年3月	财政部、税务总局
7	企业开办天数	《优化商业生态环境条例》	2020年3月	工信部
8	企业开办天数	《国务院关于在线政务服务的若干规定》	2019年4月	国务院
9	产业协同度	《关于促进制造业有序转移的指导意见》	2022年3月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0	产业协同度	《关于做好锂离子电池产业链供应链协同稳定发展工作的通知》	2022年11月	工信部、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

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网

六、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基于世界银行199个经济体数据,本文系统检验经贸摩擦背景下营商环境优化、产业升级与国家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到以下三点结论。

第一,营商环境优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直接驱动效应。研究发现营商环境优化显著提升人均国民收入、促进出口增长,同时降低基尼系数、改善收入分配,验证并拓展了“波特假说”在经贸摩擦情境下的适用性,表明制度质量提升是破解外部冲击、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关键路径。

第二,产业升级在营商环境与经济增长间发挥关键中介作用。中介效应检验表明产业升级对经济增长的系数达7477.721,中介效应占比高达91.66%,其传导机制通过产品环境、技术环境、市场环境、资源配置和组织环境五维协同优化实现。经贸摩擦与产业升级的交互效应显著为正,进一步印证了产业升级在外部冲击下具有正向调节功能与经济韧性增强效应。

第三,异质性因素制约制度效能的发挥边界。

城镇化与经济规模对经济增长具有稳定正向作用,而人口老龄化、地理区域差异呈现显著异质性,人口老龄化削弱增长动能,亚洲经济体虽有正向影响,但统计显著性不足,表明营商环境优化的政策效果受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与地理区位条件约束,需分类施策。

(二)政策启示

第一,深化营商环境五维协同改革,激活产业升级内生动力。政府以产品、技术、市场、资源配置、组织制度五维优化为抓手,构建立体化制度供给体系。产品端,建立绿色科技创新产品名录,对循环经济技术、半导体等“卡脖子”领域达标企业给予研发奖励,强化自主知识产权创造。技术端,完善“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全链条支持体系,培育创新型领军企业,深化科研院所改革,建立技术共享服务平台与市场化技术咨询机制,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市场端,打破人才与资本流动壁垒,鼓励地方政府与高校、产业界联合培养高端技术人才;创新绿色金融工具箱,综合运用信贷、债券、基金、保险等手段,为市场创新提供多元化融资支持。资源配置端,深化“放管服”改

革,简化行政审批流程,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优化税收结构,设立产业升级专项基金,引导要素向高效益领域集聚。组织制度端,提升政府服务效率,建立技术产权快速保护与维权机制;加强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打造跨产业创新生态,筑牢产业安全防线。

第二,强化国际规则制定参与,构建高水平开放合作体系。政府主动应对经贸规则不确定性,提升国际开放能力。规则制定方面,深度参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工作,推动中国在绿色技术、数字经济等领域的标准成为国际规则,提升标准“走出去”的能力,提升国际话语权。国际合作方面,依托 RCEP、“一带一路”等多边平台,加强技术引进与管理经验交流,建立区域产业链协同机制,推动原产地规则优化与绿色贸易认证互认,增强国内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贸易协定方面,积极商签高标准自贸协定,拓展多元化国际市场,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构建“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网络,对冲经贸摩擦风险。

第三,完善经贸摩擦风险防控机制,筑牢经济安全发展底线。政府建立贯穿“监测—评估—预警—响应”的全链条风险管理体系。监测评估层面,构建经贸摩擦动态监测平台,实时跟踪重点产业、关键技术的出口管制、关税壁垒变化,量化评估其对产业链供应链的潜在冲击。预警机制层面,针对绿色壁垒、人权壁垒、原产地限制等新型贸易壁垒,建立分级预警指标体系,设定风险阈值,及时发布风险警示。应急响应层面,制定产业链断供、技术脱钩等极端情景应急预案,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推动关键核心技术国产替代;设立产业安全基金,对受冲击企业提供短期纾困与转型扶持,确保经济稳定与产业安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性制度保障。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人民日报,2025-10-29(1).

[2] 李辉,张荣.中国双向投资问题研究[J].亚太经济,2012(5).

[3] 许召元.美片面夸大安全威胁 违背全球发展潮流[N].经济日报,2023-08-16(3).

[4] 刘秉镰,朱俊丰,周玉龙.中国区域经济理论演进与未来展望[J].管理世界,2020(2).

[5] Lu Y, Gu W, Zeng K. Doe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romote Bilateral Political Relations? [J]. China &

World Economy,2021(1).

[6] 吕越,马明会,李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的重大成就与经验[J].管理世界,2022(10).

[7] 殷培伟,谢攀,雷宏振.国家中心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及差异分析[J].经济学家,2023(3).

[8] 鲁永刚,张凯.资源依赖、政府效率与经济发展质量[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9(1).

[9] 刘洋,李敬,雷俐.数字金融发展推动中国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了吗?——来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证据[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6).

[10] 马永健,漆腊应.中美经贸摩擦的潜在经济效应及中国对策研究[J].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0(5).

[11] 王容博,曹历娟,朱晶.中美经贸摩擦中的农产品进口与中国粮食安全[J].国际贸易问题,2022(5).

[12] Urata S.US-Japan Trade Frictions: The Past, the Present,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US-China Trade War[J]. Asian Economic Policy Review,2020(1).

[13] 刘自敏,张娅.中国碳排放的时空跃迁特征、影响因素与达峰路径设计[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6).

[14] 温军,张森.经济开放度与中国国际技术创新——基于省际 PCT 国际专利申请数据的经验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8(11).

[15] 刘新智,黎佩雨,张鹏飞.商业生态环境优化、技术进步与产业转型升级——基于长江经济带的实证分析[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1).

[16] 刘金科,肖翔阳.中国环境保护税与绿色创新: 杠杆效应还是挤出效应? [J].经济研究,2022(1).

[17] 韩先锋,郑郁基,李勃昕,等.行政体制改革、商业生态环境优化与数字创新驱动——来自“放管服”的新证据[J].公共管理学报,2024(5).

[18] 张辉,张明哲.数字经济全球化下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安全与可持续发展[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2(6).

[19] 周博.经济震荡中美国华人移民的收入同化研究[J].人口与发展,2021(3).

[20] 关海玲,屈田雨.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基于中国 284 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J].经济问题,2023(7).

[21] 丁宁.中国银行业存贷利差的经济影响分析[J].宏观经济研究,2013(12).

[22] 储德银,程扬帆.税收商业生态环境优化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的经验证据[J].南开经济研究,2024(4).

[23] 刘文革,何斐然.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构建及国际比较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23(9).

[24] 王洁菲,姚树洁.收入差距、努力指数与居民民主

观幸福感[J].南开经济研究,2022(4).

[25] Yu L, Zhao D, Niu H, et al. Doe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expand China's export potential to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J].China Economic Review, 2020 (60).

[26] 周肖肖,贾梦雨,赵鑫.绿色金融助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演化博弈动态分析和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23(6).

[27] Audretsch D B, Belitski M. The role of R&D and knowledge spillovers in innovation and productivity[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20(123).

[28] 段玉婉,蔡龙飞.全球要素分工与国民收入——基于全球收入链的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22(10).

[29] 曾艺,周小昶,冯晨.减税激励、供应链溢出与稳就业[J].管理世界,2023(7).

[30] 李兰冰,刘秉镰.“十四五”时期中国区域经

济的重大问题展望[J].管理世界,2020(5).

[31] Ye M, Shen J H, Golson E, et al. The impact of Sino-US trade friction on the performance of China's textile and apparel industry[J]. International Finance, 2022(2).

[32] 易加斌,徐迪,王宇婷,等.学习导向、大数据能力与商业模式创新:产业类型的调节效应[J].管理评论, 2021(12).

[33] 赵永平,王可苗,蒲若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动力机制及其空间效应分析[J].山东财经大学学报, 2023(4).

[34] 曹翔,李慎婷.“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及中国作用[J].世界经济研究,2021(10).

[35] 鲁晓东,李荣林.区域经济一体化、FDI与国际生产转移:一个自由资本模型[J].经济学(季刊),2009(4).

[36] 彭水军,吴腊梅.RCEP的贸易和福利效应: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考察[J].经济研究,2022(8).

Impact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on Economic Growth: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World's Economies

DING Zuoqin¹, WANG Xiaolong^{1,2}

1. School of Accounting, Wuxi Taihu University, Wuxi 214064, China;

2. School of Education,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China

Abstract: Economic and trade frictions, as a key means of addressing regulatory constraints in the trade environment,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optimizing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upgrading industrial structures, and achiev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for nations. Porter's Hypothesis and Schumpeter's Innovation Theory can be employed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interaction between economic and trade frictions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 which still holds true even after endogeneity and robustness tests. The interactive effect of economic and trade frictions,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 through trade diversion and value creation mechanisms. In addition, this impact shows heterogeneity in terms of urbanization, aging, development degree, geographical regions, etc. Studying deeply the impact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on economic growth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policy formulation for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the context of economic and trade frictions.

Key words: economic and trade friction; business environment; industrial upgrading; economic growth
(责任编辑 昭 蓿; 实习编辑 冯 静)